

导论 神道的历史脉络与垂加 神道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神道的历史脉络

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原形神道是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形态，是一种既没有教典也没有教祖的自然发生的宗教信仰。“神道”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中国的古典文献，《周易》中就有“圣人设神道以教天下服焉”等记载，但其含义与日本的神道信仰不同。神道在日本的用法始见于《日本书纪》，有“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和“尊佛法轻神道”等提法，是指日本固有的民族信仰和祭祀礼仪。这一信仰也被称为神习、本教、神教、古道等。近世以来，随着神道理论的深化，人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探求神道的含义和本质，出现了许多有关神道的定义，其观点虽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承认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信仰。^①

从神道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大体可分为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以及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等几个阶段。原始神道产生于弥生时代（约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3 世纪），此时只有简单的祭祀礼仪而无神道理论。神社神道形成于公元 3 世纪到 8 世纪，又分为皇室神道和普通的神社神道。此时，神道由于受大陆传

^① 详见王守华的《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农文协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版，第 20～22 页。

来的佛教、儒教（日本一般把儒学称为儒教）、道教等宗教理论的影响，开始形成自己的理论。神道与佛教的结合，形成山王神道、两部神道以及反“本地垂迹说”的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神道与儒教的结合，形成度会神道、理学神道和垂加神道；复古神道则力图排斥一切外来思想的影响，力图恢复古道。明治维新以后，神道被定为国教，形成以皇室神道为核心的国家神道，并逐渐与军国主义思想相结合。二战后，国家神道被废除，神道又恢复了普通神道的地位。现在，既有以神社本厅为主的神社神道，也存在不参加任何组织的独立神社。

原始神道是神道产生后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是日本民族原始生活的反映。在原始氏族生活时期，由于人们难以解释外在的自然现象和内在的灵魂现象，就逐渐形成了神的观念。人们由于对神的敬畏和膜拜就产生了原始的祭祀礼仪，并以祭祀为中心，形成包括道德、习俗等一切文化在内的原始宗教，这就是原始的神道。神道所崇拜的神大体可分为自然神与灵魂神两大类，自然神是在对自然神秘现象难以解释的基础上产生的，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用来解释天地开辟、国土产生的创始神，如国常立尊等；二是自然物本身成为神，如神体山等。灵魂神也可分为人的灵魂神与自然物的灵魂神两大类，人的灵魂神主要是祖先灵魂崇拜，自然物的灵魂神主要是动植物的有灵崇拜。万物有灵论是人类社会早期普遍存在的信仰形态，是原始崇拜的普遍表现形式，因而多神信仰并不是神道独特的现象，而是人类早期社会普遍心态的反映，即请求各路神灵的护佑。由此可见，信仰的产生是功能性的，是人类趋福避祸、自我保存心态的写照。先民的这种崇拜意识主要产生于以下两种心态：一是畏惧感，即对不可理解的神秘力量的敬畏；二是实用性，即力图利用这些神秘力量来保护自己。在这两种心态的基础上产生了人类早期的宗教信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早期的信仰形态也随之分化发展，有的由多神信仰逐渐演变为一神信仰，如基督教；有的则保持多神信仰的形态，如神道。但不论何种信仰

形式，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都能从现实的物质生活中找到其存在的依据。

神道植根于日本民族的现实生活之中，早期的神道祭祀与先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为祈求农业丰收而产生了一系列祭祀活动，如祈年祭、新尝祭等，与此相对应，也产生了各种神如稻荷神等。播种、插秧时要祈求神的护佑，以期能获得丰收。丰收后要答谢神，期待神在来年继续祐护风调雨顺。海中捕鱼时也产生一系列祭祀活动，祈求海神保佑捕鱼者的安全、渔业丰收。早期的祭祀活动在程序上也是十分简单的，只不过是把人们的劳动成果献给神，如米、水、盐、酒、鱼、水果蔬菜等 这与其他宗教是一样的。祭祀不同的神，其祭祀场所是不同的，一般是选一清静之地，请求神的降临。这些祭祀场所逐渐固定下来，就演变为神社。由于生活中涉及各个方面 因此所要祭祀的神也很多 如山神、海神、河神、风神、火神等等。可以说，祭神活动都是功能性的，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向神祈求。同时，神道是一种神人同格教。所谓神人同格，即是指神与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不仅人死后能变为神，而且在祭神过程中，人能理解神的意愿并传达神意。人与神之间并无绝对分明的界限，只要在祭神过程中祓除秽恶、改过迁善，就能与神同在。^① 因此，在神道信仰中，并没有明显的禁忌，恶人死后也能变成神，既没有因果轮回的报应，也没有上帝时时的监督。它是一种融入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以祭祀活动为主体的多神论民间信仰。

从神道的历史来看，神道的祭祀活动和神社崇拜是最古老的，原始神道的祭祀活动极为简单，既没有今天这样的神社，也没有繁杂的祭祀礼仪。随着祭神活动的固定化和程式化，原始的祭神场所如‘神篱’、‘磐境’就演变为神社 有了固定的建筑物并形成一定的布局，使祭神活动进一步固定化和程式化。同时，由于社会统治的需要，祭神活动也逐步制度化、法律化。自大化改新（646年）

^① 参见清原贞雄的《神道史》厚生阁出版社 1943年7月版 第33页。

始日本全面学习和模仿唐朝的国家制度和思想文化，仿照唐朝的律令制度建立了日本的律令，其中就有以唐的“祀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神祇令”，把神道祭祀确定为朝廷的祭祀礼仪，并设立神祇官主持祭祀活动，其地位高于太政官，足见当时国家对祭神活动的重视。自神祇令制定以后，以神道祭祀为中心的神祇制度就被确立起来，神道祭祀活动也逐渐复杂化、体系化。同时，由于受外来宗教思想的影响，神道理论也开始产生。8世纪出现了作为神道古典的《日本书纪》、《古事记》，13世纪中叶镰仓时代，神道思想才逐渐形成，神道信仰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解释，从而步入了理论神道的发展时期。^①

《日本书纪》、《古事记》等神道古典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其中的关于天地开辟等神话故事明显地受中国、朝鲜半岛神话传说的影响。也就是说，神道作为最原始的祭祀活动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这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逐渐与外来宗教相融合，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从镰仓时代开始，神道家逐渐把神道与佛教、儒教、道教的教义结合起来，形成了最初的神道教义，使神道信仰逐渐系统化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神道派别。

平安时代，佛教开始兴盛起来，受其影响，产生了以“本地垂迹说”为中心的佛主神从的神道理论。所谓“本地垂迹”即是说印度的佛祖垂迹日本，普渡众生，神也就是佛，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的化身，神皈依于佛。在此基础上，佛教天台宗与神道的融合产生了山王神道，真言宗与神道的融合产生了两部神道。山王神道又称为一实神道、日吉神道、日枝神道等，虽然人们对山王的解释不同，但它是用天台宗的教义来解释神道的神和祭祀礼仪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两部神道也被称为真言神道、两部习合神道等。“两部”是指真言宗的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教义，两部神道宣扬伊势神宫内宫祭祀的天照大神是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外宫祭祀的丰受大神

^① 参见安苏谷正彦的《神道思想的形成》 搪鹅出版社 1991年4月版 第271页。

是金刚界的大日如来，伊奘诺尊、伊奘冉尊是金胎两部大日如来的化身。因而，佛即是神，神即是佛，神是佛的化身。山王神道和两部神道都主张佛主神从，神道应服从佛教。

进入镰仓时代以后，国家政权掌握在幕府手中，当时的统治者源赖朝宣扬神国思想，从政策上支持神道，使神道势力强盛起来。伊势神宫外宫的神官度会行忠、度会常昌等借此时机反对本地垂迹说，从而创立了神主佛儒从的伊势神道。伊势神道也叫外宫神道、度会神道，是中世以来影响巨大的神道派别之一。它是在吸收佛教、儒教和道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神道教义的，作为其教义经典的神道五部书《天照坐伊势二所皇大神宫御镇座次第记》、《伊势二所皇大神御镇座传记》、《丰受皇大神御镇座本纪》、《造伊势二所大神宫宝基本记》、《倭姬命世记》集中体现了伊势神道的思想。伊势神道宣扬，国常立尊是宇宙的本原神，具有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秘力量。同时，伊势神道还把神的创生力量与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认为外宫祭祀的丰受大神与国常立尊同体，属阳，具水德；内宫祭祀的天照大神属阴，具火德。国常立尊与天照大神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同时内宫的天照大神作为阴神是内藏的即是胎藏的意思；外宫的丰受大神作为阳神是外显的，即金刚的意思。这样，内外两宫的阴阳之神又与金胎两部相结合，从而使伊势神道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伊势神道所宣扬的清静正直也是受佛教的影响，而其中的伦理道德学说则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伊势神道是在综合了佛教、儒教以及阴阳五行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教义是十分繁杂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到室町时代后期，神道势力逐渐衰退，伊势神道由于力图恢复皇室的权威而失去幕府的支持，在此情况下，吉田神社的宫司吉田兼俱（1453~1511）借助于幕府的支持，在继承神国思想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吉田神道。吉田家原姓卜部，因此也称为卜部神道，又依其神道理论，称其为元本宗源神道、唯一宗源神道等。吉田神道的经典主要有《神道大意》、《神道由来记》、《唯一神道名法要集》

等。吉田神道主张，神道是根本，儒教、佛教都是神道的枝叶果实，都是从神道中分化出来的。吉田兼具认为，神是先于天地而定天地、超越阴阳而成阴阳的先验存在，其所信仰的最高神——大元尊神是宇宙的本原神，而神的存在是与人的心灵相呼应的，一切显现的存在最终都要归于心灵，心是包罗万象的，因而也是神明之舍。吉田神道的教义具有较深的哲理，其中也明显地留下了儒教、佛教、老庄的思想印记。

进入江户时代后，由于我国宋朝朱熹的学说作为德川幕府的官学走上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神道随之大量吸收儒家的思想，产生了许多神儒结合的神道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度会神道、理学神道、垂加神道等。

江户初期，伊势神宫外宫的神道家度会延佳（1615～1690）以复兴伊势神道为己任，从神主儒从的立场出发，吸收儒家、道家、阴阳五行的思想，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度会神道。他反对神佛习合之说，也反对崇拜外国思想而轻视本国思想的主张，认为神道是日本思想的根本，是天神地祇相传的终极之道。他进而认为，天御中主神与儒教所主张的“理”是一致的，神道就是“天地自然之道”。因此，他极力主张应运用儒家的思想原理解释神道，因为儒教与神道的根本思想是一致的，但他又反对简单的神儒习合，反对把儒教与神道两种思想简单地拼凑在一起。他进而认为，神道修行的根本是忠厚正直，这既是儒家修身治国的根本，也是天御中主神所传的终极之道。

与度会延佳同时代的吉川惟足（1616～1694）在吉田神道的基础上，把神道与朱子学、武士道结合起来，创立了吉川神道。由于吉川惟足认为朱子理学中的“太极”就是神道的本原神国常立尊，主张以理学理论来解释神道，因此他的神道也被称为理学神道。理学神道特别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之间的道德关系是至高无上的，君臣上下的秩序是万古不变的，支撑人伦关系的根本是“敬”与“义”。因此，“敬”“义”是治世的根本原

理。吉川惟足认为，神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君臣之道，这一观点对山崎暗斋的神道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吉川神道所宣扬的敬义思想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并与武士的行为准则相一致，因此，吉川神道在民众与武士阶层中颇为流行。

山崎暗斋(1618~1682)的垂加神道是在广泛吸收伊势神道、吉田神道、度会神道、吉川神道等诸派神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他被看作是近世神道理论的集大成者。由于他是崎门朱子学的开创者，所以他的神道思想也被称为崎门神道、山崎神道。下面将详细论述垂加神道的创立过程和历史地位。

在垂加神道之后还有复古神道、国家神道等派别，神道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化之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现代日本人的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但这些都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故在此不一一赘述。

第二节 垂加神道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

山崎暗斋是日本近世著名的朱子学者，垂加神道的创始人，被誉为日本精神的开山鼻祖之一。山崎暗斋生活的时代是江户初期德川幕府统治刚刚确立的时期。17世纪初，德川家康(1542~1616)在关原之战中取得胜利，从而统一日本，迫使天皇任命自己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开始了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刚刚经历过战乱的德川幕府必然寻求思想上的支持，而朱子学就是为了适应德川幕府统治的需要而走上日本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山崎暗斋由一著名的朱子学者转而创立垂加神道，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了解这一背景对理解山崎暗斋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社会自应仁之乱(1467~1477)以后社会统治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原来的庄园制村落形态逐渐崩溃，地方大名势力日益强大，原先居住于农村的武士逐渐向城下

集结 使城下町发达起来。加之西方的铁炮传来 使战斗方式发生变化 由原来的单兵作战变为集团作战 从而形成武士集团。在武士集团中 原来的世袭的主从关系被打破 单凭对主人的服从已不能维系武士集团的内部关系 这就必然要求一种新的主从关系 以维护武士集团内部上下关系的稳定性，这就是儒家宣扬的以“礼”为规范的君臣道德。君臣道德要求臣、子对君、父的绝对服从 这种服从是以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为基础的。日本进入近世以来，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被进一步强化，武士的身份完全不同于庶民 具有很大特权。士是劳心者 庶民是劳力者 这种差别被固定下来 就成为严格的上下定分的身份制度。这样一来 朱子学所提倡的敬神尊祖、尽忠致孝、节情欲、禁争夺 正好适应当时的需要，江户幕府提倡朱子学就是必然的了。德川家康用武力统一国家以后 建立起以将军为最高权力中心的国家制度 其主要依靠力量就是武士 因而只有使整个武士阶层忠诚于自己 德川幕府的统治才能得以巩固。德川家康认为，朱子学所宣扬的君臣大义名分、国家大一统、天命论、汤武放伐等思想最适合自己的统治需要。他认为 君臣大义名分、国家大一统思想能稳固自己的统治 而得民心者王、汤武放伐等思想又能为自己取代丰臣秀吉（1536~1598）做出合理解释 因而是最适合自己统治的政治理论。这样 朱子学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 走上了日本近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朱子学在镰仓幕府初期就已经传入日本，在日本发现最早的是正治二年（1200年）的朱子的《中庸章句》^①，但在整个镰仓、室町幕府统治时期，幕府信奉和支持的都是禅学，朱子学只作为禅学的附属学问被加以利用。并且，此时期的日本儒学为朝廷博士家所把持，而博士家修习的是汉唐的训诂之学，由于博士家恪守家法 抱残守缺 偏重经典训诂 忽视儒家修己治人、立身处

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和朝鲜》，东京大学出版社 1965年3月版 第1页。

世之道，因而逐渐衰落下去。由五山学问僧传入朱子学以后，由于朱子学重义理之学，倡导穷理尽性、持敬静坐，与佛教的见性成佛、坐禅等相通，因而深受禅僧的欢迎。于是朱子学通过禅僧的传播，逐渐取代了博士的家学。同时，由于五山学问僧从室町幕府时期就掌管着幕府的政治外交，他们主张儒佛一致、儒释不二，认为朱子学与禅学思想并不冲突，特别是在治国经略方面，朱子学更具实用性。因此，五山僧侣也借用朱子学中的一些治国方略，为幕府统治出谋划策。同时，神道家也援引朱子学思想来解释神道，如吉田兼俱（1435～1511）的唯一神道中就有大量的朱子学观点，吉田神道主张神、儒、佛相互融合。清原宣贤（1475～1550）则在综合五山学问僧的思想与吉田神道神、儒、佛相互融合思想的基础上，对朱子四书中的理气心性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试图把神、儒、佛各种思想加以融合。受其思想的影响，在日本中世后期就出现了禅、儒、神折衷综合的趋势。但总的说来，在近世以前，朱子学是一种附属于禅学的学问，并未取得独立的社会地位。

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以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推行积极的文教政策。在当时佛教势力极为强大的情况下，他主张从儒家思想中寻求治国之道。儒家的天下大一统、现实的德治主义主张，对德川幕府的统治都是极为有利的。但当时在幕府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幕府阁老都是佛教徒，如得到德川家康重用的承兑、元佶、崇传，三要都是禅僧，他们在幕府中掌握着文教、外交、寺社行政等政治实权，具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德川家康要实行儒家的治国之道，就必须向当时的儒学家寻求治国方略。因此，他招聘当时的大儒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讲解《贞观政要》、《汉书》、《十七史详节》等著作，以把握古今治乱兴亡的道理。德川家康特别推崇唐太宗的治平之策，认为“马上可以得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的道理也适合于日本。因此，他极力遵信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圣贤之道，从而大力提倡儒教。他不仅招藤原惺窝、林罗山讲

解儒家的治国之策 而且命其属下出版了《孔子家语》、《三略》、《六韬》、《贞观政要》等一大批儒书。同时 幕府还任命林罗山等儒教者为官 采用儒家的治国方略 制定积极的文教政策。不仅幕府大力提倡朱子学,而且朝廷也十分重视它。后阳成天皇 1587~1612 在位 好儒学 曾敕令开版印刷《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 且均采用朱子的注释 这些书籍对日本近世儒学的发展有较大贡献。后光明天皇 1644~1654 在位)最崇信朱子学,不仅重刊《性理大全》而且立圣庙 令朝山意林庵讲《中庸》、《周易》。天皇尊儒 上行下效 朱子学在公卿贵族中间也流行起来。由于朝廷的提倡和幕府的奖掖 朱子学在日本逐渐兴隆起来 开始走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舞台。黄尊宪在《日本国志》卷三十二中总结道:“逮德川氏兴 投戈讲艺,专欲以诗书之泽 销兵戈之气。于是崇儒重道,首拔林忠于布衣 命之起朝仪 定律令 俾世司学事 为国祭酒 及其孙信笃遂变僧服种发,称大学头。而儒教日尊,幕府既崇儒术,首建先圣祠于江户 德川常宪自书大成殿字于其上 鸟革翬飞 轮奐俱美 诸藩闻风仿效各建学校 由是人人知儒术之贵 争自濯磨,文治之隆 远超前古。”

统治者在利用朱子学治国平天下的同时,又利用神道神化自己的权力和人格 从宗教上寻求支持。为此 德川幕府又支持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的发展。日本中世以来,佛教势力日益壮大,一些大的寺院拥有僧兵 雄霸一方 甚至与将军势力相抗衡。在织田信长(1534~1582)时代,为了削弱妨碍他统一天下的佛教教团势力,也为了获得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 信长转而支持基督教 企图从政治上利用基督教为自己的军事统治服务。同时,他又利用神道来神化自己,试图借用宗教的力量来取代天皇的权威。在现实的政治权力运作上 他把天皇的权力收归于自己 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天皇的权威推行武力统一天下。织田信长的后继者丰臣秀吉进一步神化自己,他把自己打扮成受托于天命来完成天下统一的神 他命人编造神话 说自己出生之时就有神奇之处 是神

显现。丰臣秀吉在侵略朝鲜之前给朝鲜国王的国书中就神化自己说：“虽然予当于脱胎之时 慈母梦日轮入怀中。相士曰 日光之所及 无不照临 壮年必八表闻仁风 四海蒙威名者何疑乎。依有此奇异 作敌心者自然摧灭 战则无不胜。”^① 这虽然是为了恫吓被侵略者 以摧毁其抵抗心理 但也反映了自我神化的一面。丰臣秀吉一方面利用佛教神化自己 在方广寺建大佛像 以纪念自己的功绩。另一方面又利用神道神化自己，把自己打扮为神。丰臣秀吉死后 被奉为“丰国大明神”并建丰国神社加以祭祀 这是神道直接参入武家权力社会的开始，也是神道向近世神道转化的端始。虽然丰国神社随着丰臣政权的灭亡而衰落下去，但神道参与近世武家统治的趋势却愈演愈烈。

德川家康开创德川幕府以后，在积极推行儒家的文教政策的同时，也利用神道神化自己的统治，使神道势力进一步与武士的世俗力量相结合 使神道思想进一步普及、推广开来 从而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德川家康力图在佛教、儒教与神道之间取得平衡，使不同宗教势力之间相互制约，并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为此 他采取三教并重的策略 在继续重用禅宗教徒的同时 采用儒官和儒家的文教政策，并利用神道神化自己。他死后，被奉以“东照大权现”的神号 举行神道葬礼 设立名为“东照宫”的神宫，被作为神灵加以祭祀。现实人格被神化的目的是为了祈求幕府政权的永恒化，是为了维护幕府权力的稳定性。神道这一本是维护天皇统治的宗教也借机变换形态，成为维护幕府统治的工具。

幕府统治是武士统治 国家权力掌握在将军手中 使天皇权力虚置，这样就必然存在政治信仰与政治权力上的冲突。德川幕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必然要寻求政治上思想上的支持 为自己的

^① 《吉川神道》，《神道大系》论说编 神道大系编纂会编 精兴社 1983年10月版，解答题第22页。

统治作合理性辩护。而中世末期的连年混战，使统治思想极为混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佛教势力已经衰朽，佛教所主张的出世思想已不适应德川幕府的统治需要。因此，政治经济条件的变迁必然呼唤新的统治思想的产生，这就是进入近世以后朱子学主流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围绕德川初期政治思想的讨论，一般都把政治思想等同于社会的意识形态，把社会意识形态等同于朱子学。不知不觉中，朱子学传统享有了政治说教和正当性战略的独断权利。”^①朱子学就是这样逐渐走上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为了与天皇的神统地位相抗衡，强化幕府统治的正当性，德川幕府统治者不断神化自己的统治权力，御用思想家们则把朱子学与神道思想结合起来，以神化幕府的统治。因此，在德川幕府统治初期，统治者大力支持朱子学，强化朱子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使朱子学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与固有的民族信仰——神道相结合，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朱子学者和神道理论家。藤原惺窝作为日本近世儒学史上的开山人物，其最大贡献是使儒学摆脱禅学的束缚，走向独立。他由一个佛教徒转过来批判佛教的出世主义，肯定儒家的积极的入世精神，认为佛教是绝人伦、灭义理的异端邪说。其弟子林罗山在《惺窝先生行状》中指出：“先生以为我之从事于释氏，然有疑于心。读圣贤书，信而不疑。道果在兹，岂人伦外哉！既绝人种，又灭义理，是所以为异端也。”^②惺窝立场的转变，使近世儒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他的弟子林罗山不仅继续推进儒学的发展，而且参与到幕府的决策中去，使儒学与当时的政治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林罗山特别推崇朱子学而排斥阳明学，他把朱子学与日本的神道思想结合起来，创立“理当地神道”。他提出“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日本是神国，由于佛教流行，才使神道王道衰退。”他指出：“我朝神国也，神道乃

① 赫尔曼·奥姆斯：《德川意识形态》，搪鹅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9页。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77页。

王道也。……自佛法兴行后，王道神道都摆却去。”^①为此，他极力揭露和批判佛教对社会的危害，主张用朱子学取代佛教的思想统治地位。林罗山的这一主张得到幕府的支持，从而使朱子学逐步走上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在藤原惺窝、林罗山的提倡下，朱子学在日本得到迅速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和一大批思想家。除藤原惺窝、林罗山开创的“京师朱子学派”外，还有以安省庵（1622~1701）、贝原益轩（1630~1714）为代表的“海西朱子学派”。他们提倡自由的学风，主张学问应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实学的研究。同时，贝原益轩认为神道与朱子学并行不悖，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以编纂《大日本史》而出名的水户学派则极力提倡朱子学的大义名分思想。他们从大义名分的立场出发，提倡尊王爱国，反对佛教的虚妄，主张朱子学与神道的一致。除朱子学各派外，还有与之相对立的古学派、阳明学派等。古学派以山鹿素行（1622~1685）为先导，由伊藤仁斋（1627~1705）所创立。他们从儒家的道统观念出发，认为正统儒家思想自孟子以后已不传，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儒学是异端邪说，他们主张应回到孔孟的思想中去，以接孔孟之真传。他们的这一复古主张被称为古学派，其中以伊藤仁斋、伊藤东涯父子为代表的主张重新阐释《论语》、《孟子》古义的被称为“古义学派”。以荻生徂徕（1666~1728）为代表的主张要回到孔孟的思想中去，必须先学会中国的古代语言，能够直接阅读古汉文，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古义。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古文辞学派”。古学派与当时的朱子学针锋相对，彼此之间进行着激烈地辩驳。阳明学传到日本后，由于中江藤树（1608~1648）的提倡渐成独立的一派，其门人中较为著名的有熊泽蕃山（1619~1691）等，他们肯定王阳明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思想，并主张儒学与神道相结合，提倡神儒合一。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第 188 页。

在近世初期 不仅儒家各派思想活跃 而且神道各派在吸收、借鉴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也活跃起来。伊势外宫的神官会延佳在吸收朱子学的基础上，积极复兴伊势神道。他认为神道与朱子学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天地自然之道”。他在坚持神儒一致的基础上，力图使伊势神道的教义进一步体系化。吉川惟足则把吉田神道的教说与朱子学结合起来，用神道的“土金”思想去附会阴阳五行说，由此提出神道是“诚之道”其本质与儒家的主张是一致的。

近世初期儒学各派的活跃以及儒学与神道的融合为山崎暗斋的学术生涯和社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和丰厚的文化土壤 他所代表的“海南朱子学派”也被称为“崎门朱子学”主张严格恪守朱子学的立场，原封不动地照搬朱子的著作而不作任何创新，所以被指责为教条、保守。但保守、教条的山崎暗斋却主张朱子学应与神道相结合，并在综合神道各派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垂加神道。山崎暗斋的朱子学和神道思想都对近世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当时的显学。

第三节 山崎暗斋的生平与垂加神道的历史地位

山崎暗斋名嘉 字敬义 号暗斋 又号垂加 世称嘉右卫门 是江户初期一虔诚的朱子学者。他的虔诚从其名字可窥见一斑，其名“嘉”字与朱熹的“熹”字相似 其字“敬义”得自朱熹的敬义说 其号“暗斋”与朱熹的号“晦庵”意思相近。由此可见其对朱熹的崇拜。山崎暗斋于元和 4 年（1618 年）12 月 9 日生于京都 父亲以针灸治病为生 家境贫寒。暗斋自幼聪明颖悟 但性情顽皮 母亲管教颇严 常嘱其要读书识字 不读书的人如同盲人一般。暗斋七八岁时始读四书及法华经，悟性颇高。由于其顽皮难以管教，在其 12 岁时父亲把他送到比睿山出家修行，先在妙江寺剃发为僧，后在土佐吸江寺继续修行，师从谷时中（1598~1649）读四书五经 并

与野中兼山(1605~1663)、小仓三雀(1604~1654)交往甚密,常在一起切磋研究儒教,始知佛教之荒谬,25岁时弃佛归儒。水足安直在《山崎先生行实》一文中指出:“宽永十九年壬午,先生二十五岁。一日觉纲常伦理之外,别立教说道,故非理之正,获罪于天之大者,愤然归儒。”^①当然,思想的转变并非是偶然的。后来暗斋在《辟异》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吾幼年读四书,成童为佛徒,二十二三本于空谷之书作三教一致之胡论。二十五读朱子之书,觉佛学之非道,则逃焉归于儒矣。今三十而未能立,深悔吾之不早辨,又惧人之可终惑,故此篇之述不得已也。”^②由于暗斋弃佛归儒,并转而批判佛教,惹怒土佐太守,土州太守痛恶先生攘斥浮屠之严且勤,而欲逐之。兼山谏曰:“嘉也,其志正大,其学纯粹,真儒也,逐之甚不可。太守不听,遂逐之。”^③由于当时佛教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国家法令也禁止公开批判佛教,暗斋的处境可想而知。他从土佐回到京都,蓄发还俗,生活已是十分艰难,幸而有野中兼山相助,才勉强为生。思想的转变,促使暗斋发愤于朱子学。由于朱子学在当时的中国已成为正统之学,朱子的著作已作为科举考试的通用教科书流行于社会。明初永乐帝把宋元以来程朱派各家的注说编成《性理大全》、《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等注解之书,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穿凿附会之说,从而难于把握程朱的真实思想。这些著作在江户初期流入日本,加之日本人自己的许多翻刻本,使朱子的真实思想淹没于浩瀚的注疏之中。暗斋认为,应依据朱子思想的发展脉络,精读细研朱子的原著,以发掘其真实的思想。为此,他专注于朱子的著作,去除后人附加于朱子思想之上的各种附会之说,以恢复朱子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暗斋

《垂加神道》上,《神道大系》论说编十二,神道大系编纂会编,精兴社,1984年3月版,第527~528页。

^② 《山崎暗斋全集》第3卷,塘鹅出版社,1978年5月第1版,第450页。

^③ 《垂加神道》上,《神道大系》论说编十二,神道大系编纂会编,精兴社,1984年3月版,第528页。

对朱子的原著进行了新的梳理和注解，从朱子浩瀚的著述中选出精华部分进行新的编纂和注解。对《四书集注》、《小学》、《近思录》、《易经本义》、《易学启蒙》等书中后人所加的注解增改进行了删正，以期获得朱子的真实思想。暗斋 30 岁时作《辟异》一文，对朱子学以外的诸如佛教、道教、陆王之学等进行批判和辩驳。对自己的佛教信仰进行了清算。其后著有《白鹿洞学规集注》、《敬斋箴分注附录》、《大家商量集》等著作，开始阐明自己的朱子学立场。明历元年（1655 年）38 岁时在京都始开讲筵，讲授《小学》、《近思录》、《四书》、《周易本义》、《程传》等著作，其影响渐大，门徒渐多。其中佐藤直方（1650~1719）、浅见炯斋（1652~1711）、三宅尚胤（1662~1741）被誉为崎门三杰。暗斋一生致力于朱子学研究，编纂、校正朱子学及相关著作达 40 多种，其学说自成一派，影响巨大。暗斋学派遂成近世日本朱子学的一大流派，对日本社会发生了深远影响。

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怀有宗教般的尊崇。他对门人说：“我学宗朱子，所以尊孔子也。尊孔子以其与天地准也。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吾与孔子、朱子亦窃比焉。而宗朱子，亦非苟尊信之，吾意朱子之学，据敬穷理，即祖述孔子而不差者，故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也，何遗憾之有。是吾所以信朱子，亦述而不作也。汝辈坚守此意而勿失。”^①由于暗斋笃信朱子学，严守述而不作的立场，他本人并没有成体系的大部头朱子学著作，大部分都是朱子学著作的抄录和注解，他的思想就隐藏在这些著作之中。因此，也有人认为山崎暗斋的思想并没有新奇之处，只不过是朱子思想的简单重复而已，这种观点是把暗斋思想过于简单化了。山田连在《暗斋先生年谱》中对山崎暗斋的学术风格作了如下概括：“先生学尚研精，不守章句，所见超逸，居常以激励风节。抑黜百家为己任，

^① 《暗斋先生年谱》，《日本儒林丛书》第 3 卷，风出版社 1971 年 11 月版，第 10 页。

博涉坟典 折衷紫阳。易则原太古之精义 范则明九峰之全数 凡自濂洛关闽以下 扬榷表揭 分析经纬。所述以垂世 几乎数十百卷 而其所为归 不出洒扫应对 忠信笃敬之间。终身持论谆谆言，汉之董 隋之王 唐之韩 非思不覃也 非语不详也。惟其不斯之察 所以不臻乎极。’^①可见 暗斋对中国的古典 上从易经、洪范，下至程朱之学 无不精研细读。从秦汉至隋唐 从隋唐至两宋 他对中国儒学的把握极为精到。他虽然固守朱子的学说而不越雷池，但并不表明他的儒学知识是狭隘的。山崎暗斋不仅恪守朱子学的立场 而且积极提倡朱子学的实践精神。山田连指出：“先生教人 以居敬穷理为为学之要。常谓门人曰 学之道 在致知力行，而存养则贯此二者也。汉唐之间 非无知者也 非无行者也 但未曾闻存养之道，则其所知之分域，所行之气象，终非圣人之徒也。’^② 山崎暗斋一生都贯彻着朱子学的居敬穷理、修身养性的实践精神 并尽己所能 把它贯彻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去。他在协助会津侯保科正之治理所封领地时就积极实践朱子的主张，当时就采取了诸多措施：“正神社 为之志。废佛堂 斥佛寺。置葬地 禁火葬。立社仓 行常平。谨权量 宽租税 制柴余漕运之法。听讼本人伦 查事情 遣监司巡封内，下情上达。凶年防之 饥岁赈之，九十以上岁与口养。孝子节妇赏之，不忠不悌罚之。穷人无归则给之 旅客有疾则济之 未尝有一人饿莩者也。是皆由于先生教导之力也。’^③ 这虽是对保科正之功绩的评价，但朱子社仓法的实行 减税赈灾 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尺度进行赏罚 则都是在山崎暗斋的指导下进行的。

《暗斋先生年谱》，《日本儒林丛书》第3卷 凤出版社 1971年11月版 第10~11页。

（暗斋先生年谱），《日本儒林丛书》第3卷 凤出版社 1971年11月版 第11页。

（垂加神道）上，《神道大系》论说编十二 神道大系编纂会编 精兴社 1984年3月版 第529页。